

辽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辽宁教育史志



993 第二辑

PDG

目 录

在“中国东北教育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欢迎词·····	陶增骈 (1)
答词·····	(日)海老原治善 (2)
关于伪满教育史的研究·····	卢鸿德 (3)
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及其运用·····	李 放 (7)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教育史的几个问题·····	颜震华 王庆玲 (13)
“满洲、满洲国”教育史研究的课题——基于日本收集的资料状况 ·····	(日)槻木瑞生 (20)
促使“满洲”侵略正当化的意识形态与教育·····	(日)宫坂广作 (27)
中国东北地区近代教育概述·····	苏 甫 解传路 (31)
奉天学制改革简论·····	魏正书 (37)
近代来华日本教习考略·····	黄新宪 (40)
论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教育与东北人民收回教育权·····	刘兆伟 (46)
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教育评析·····	齐红深 (53)
日本在“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的教育侵略政策·····	陈丕忠 (66)
“关东州”教育评析·····	杨 晓 (73)
满铁附属地中国人教育评析·····	解传路 张德兰 (84)
关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关东州”社会教育的研究·····	傅维利 陈 娟 (89)
满铁附属地日本人子女教育的特点·····	(日)小岛胜 (95)
“满洲国”成立以前的“关东州”、满铁附属地的中国语教育 ·····	(日)竹中宪一 (100)
“满洲”时代日本人的教育与补充教科书编纂·····	(日)矶田一雄 (101)
奴化教育是伪满教育的核心·····	吕恒庸 朴春燕 (107)
伪满“新学制”及特点·····	公亚男 (110)
伪满统治者的民族分裂主义教育政策·····	姜振卿 (114)
伪满教育与教会教育之比较·····	宋恩荣 熊贤君 (117)
伪满教育琐谈·····	赵金凯 (126)
伪满洲国中等教育制度的演变·····	王 桂 (130)
伪满高等教育面面观·····	刘乐群 (138)
伪满奉天省普通中学教育·····	赵长胜 (141)
伪满的师范教育·····	郎人骏 张永红 (150)

略评伪满洲国的职业技术教育·····	马立武 (146)
伪满洲国中等职业教育述评·····	王国辉 (156)
伪满洲国教育督导述略·····	徐治中 (161)
伪满洲国成立前后的少数民族教育·····	苑景亮 (164)
东北沦陷时期朝鲜族教育·····	朴泰洙 (172)
安东教育救国会惨案始末·····	于 涛 (177)
日伪统治下的国立新京师范大学·····	刘忠俊 (180)
日伪统治中国东北时期的沈阳教育·····	陈其典 (181)
对鞍山遭受日本文化侵略的回顾·····	杨再芳 (184)
在日本学习的回忆·····	臧欣然 (188)
15年战争和对中国的教育侵略·····	(日) 小泽有作等 (190)
伪满洲国的技术人员、技工的养成·····	(日) 原正敏 (203)
“满洲国”政府的教科书政策·····	(日) 驹达武 (208)
民族协和与建国大学的教育·····	(日) 志志田文明 (219)
派遣“大陆新娘”的实际情况和对战后日中社会的影响 ·····	(日) 相庭和彦 大森直树 中岛纯 (226)
解放初期的旅大教育(1945—1949)·····	陈丕忠 (232)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朝阳教育·····	耿立贤 (246)
东北沦陷区教育与解放区教育的比较研究·····	刘占华 邓晓春 (253)
中国东北教育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总结发言·····	(260)
现代日本教育批判·····	(日) 宫坂广作 (267)
借鉴日本私立大学的经验促进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	邓晓春 (269)
论中国现代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	纪芝信 (278)
日本“满洲国”教育史研究会给辽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的感谢信·····	(286)

在“中国东北教育史国际学术 讨论会”上的欢迎词

辽宁省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辽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陶增骈

(1993年8月9日)

各位专家、学者，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天，中国东北教育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这里召开。各位专家、学者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将进行为期五天的学术交流和参观访问。这对于繁荣东北教育史的研究，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学术交流和传统友谊，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日本东海教育研究所、伪满教育史研究会，以及槻木瑞生、金子和彦等先生为促成这次聚会做出了努力，我代表辽宁省教育委员会、辽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和主办单位，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东北地区作为古老文明的中国的一部分，早在四、五十万年以前，人们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发展。中华各族人民在共同生活和开发、建设东北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进行着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而且是中国和日、朝、俄文化、教育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一个交汇点。东北教育史在中国教育史中占有重要位置，它既具有全国性的一般特点，又具有某些特殊性，有着宝贵的研究价值。深入开展东北教育史的研究，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对于搞好教育改革，促进现代化教育发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鸦片战争以后，沙俄、日本等帝国主义先后入侵中国东北。1931年“九·一八”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全东北，扶植傀儡政权，建立伪满洲国。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日本人民也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这一段不幸历史值得中日两国共同记取。

教育不可能脱离政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推行的教育政策，是其整个侵略政策的组成部分，是为实现其侵略扩张目的服务的。因此，当我们研究“关东州”和伪满洲国的教育历史时，应当站在正确的政治立场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研究东北教育史，同一切历史研究一样，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我们辽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投入了较多人力、物力，搜集了一大批珍贵资

答 词

日本“满洲国”教育史研究会代表

海老原 治善（槻木瑞生代）

让我来简单回顾一下，以“满洲国”教育史研究为主题的日中共同研究的历程，就以此作为我的答词吧。距今约两年前的1991年5月，我作为东海教育研究所教育改革研究会访中国的团长，访问了长春和沈阳。在这之前，我只是参加过以北京为中心的日中教育研究的交流，去中国的东北访问还是第一次。其目的，就是通过日中共同研究“满洲国”教育史，来确实实现日中联合和友好。访问之前，在日本国内组织起一个小型的研究会，叫做“满洲国”教育史研究会，作为本次访问的准备工作。这个问题的提出，得到了以学问深厚的王野平先生及齐红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方面的极力支持。从此，迈出了日中共同研究“满洲国”教育史的第一步。此次访问东北，承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金世柏先生同行，我们得到了很多照顾。

归国后的9月18日，（这一天正值“九·一八”事变60周年），也有向日本国内报告访问成果的意向，我们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日中“满洲国”教育研究会议（“满洲国”教育史研究会主办）。约有40人参加。翌年的1992年8月24日至25日，这次我们迎来了中国的4位先生，召开了第二次“满洲国”教育研究会议（东海教育研究所主办）。这次历时两天的会议共有约百人参加。此次会议成果，经东海教育研究所的金子和彦先生的努力，刊登在《日中共同研究“满洲国”教育史研究》第一号上（东海大学出版，1993年）。在此期间，“满洲国”教育史研究会倾力编纂了《“满洲、满洲国”教育资料集成》，并出版了第1、2、3期资料集成。

有了这样的日中共同研究的基础，今天，我们在大连召开了以“满洲国”教育史研究为主题的中国东北国际学术会议。我们日本方面，把此次国际会议作为第三次日中“满洲国”教育研究会议。现在，我们已走向了亚洲环太平洋时代，我期待着由共同的学问带来的这深厚的联系，通过此次会议会更加美好。对于筹备会议的以齐红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的各位先生的努力，我深表谢意。谢谢。

料，并且正在陆续进行整理和编写《东北教育史研究丛书》。同时，我们也感到，有必要与日本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会进一步加强和密切这种合作。

最后，预祝会议圆满成功！祝愿东北教育史的研究更加繁荣！祝愿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进一步发展！

关于伪满教育史的研究

卢鸿德

中日两国的学者欢聚一堂，共同召开中国东北教育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对于推动东北教育史研究的深入，加强中日教育和文化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会上，大家将重点围绕伪满教育史进行研讨。我正在主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教育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借此机会，我想就伪满教育史的目的、方法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同各位学者讨论。

一、为什么要研究伪满教育史

从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取得旅大租借权和南满铁路经营权之后，便开始了在中国东北的教育侵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持傀儡政权，建立伪满洲国，直到1945年无条件投降。这40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推行奴化教育的历史，不仅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中的重要一页，也是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教育史工作者认真地加以研究。

马克思说过，人和动物不同，人在做一件事之前就已有了明确的目的，并且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进行设计。那么，人们抱着什么目的和出发点来研究伪满教育史呢？我看，大概不外乎三种目的：

一种是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为教育侵略涂脂抹粉，或者为侵略者制定教育政策提供咨询意见和历史借鉴。早在4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就已开始对中国东北和伪满教育史进行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山田丰的《满洲教育史考》、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学务课编印的《满洲教育史略》、嶋田道弥著的《满洲教育史》。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豢养了一批御用学者，他们歪曲史实，掩盖真象，篡改历史，散布“满洲非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文化侵入满洲”，妄图为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侵占东北制造理论依据。他们或者竭力宣扬日本侵略者在殖民地的所谓功绩；或者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权衡教育政策的得失良否，为日本侵略者进一步修订、完善殖民教育政策献计献策。这样，便不可能通过对史实的全面分析来得出正确的结论。因而是值得反对的。前几年，日本少数右翼分子制造“教科书事件”，妄图复活军国主义，遭到了中日人民的谴责。在伪满教育史的研究上，是不是也有人抱着这样的目的？

第二种是说自己研究伪满教育史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也不作结论，只对史实进行客观的描述。这种“为研究而研究”或“历史主义”的史学观在旧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曾经比较盛行，一些学者为了明哲保身，不落犯上作乱、借古讽今的罪名，故意把自己局限在烦琐考据的象牙塔里，故意把观点、见解隐瞒起来；一种是由于受到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缺乏洞察历史规律的能力。实际上，不加评论不等于没有观点，

不带政治倾向性不等于没有倾向性。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人不可能没有阶级立场。作为社会科学的史学著作，必然会带有作者的某种观点。中国是个史学大国。孔子作《春秋》，是为了使“乱臣贼子者惧”。清代史学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欲知大道，必先知史”。他以周代的历史为例，说明“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的道理，强调治史要面对社会现实，要从史实的叙述中引出治乱兴衰的理论认识。这种经世致用的史学观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种是站在人民和进步的立场上，从维护和平、加强中日友好、总结历史教训、发展教育事业的目的出发来研究伪满教育史。我们知道，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和奉行的殖民地方针不仅给中国人民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它推行的奴化教育不仅中国人民是受害者，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以翔实的历史揭露和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进行教育侵略的方针、政策、措施和造成的后果，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是所有严肃的、负责任的中日教育史学者共同的历史责任。以海老原治善先生为代表的日本“满洲国”教育史研究会多次表示要对伪满教育进行检讨，要促进中日友好，反对军国主义复活。我们赞许这种态度。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鲁迅在赠日本友人的诗中写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主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教育史》的课题，就是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对教育史实的叙述和分析，得出符合历史规律的理论性认识，从而达到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加强和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目的。我相信，只要我们站在人民和进步的立场上，就一定能把伪满教育史的研究搞好。

二、怎样研究伪满教育史

确立了正确的研究目的之后，还需采取正确的研究方法，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我认为，研究伪满教育史，除了一般的方法之外，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要把伪满教育放在当时日本和中国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加以研究。

教育作为培养人、教育人的社会活动，与政治、经济之间存在着本质的、直接的联系。一定社会的教育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支配、制约并为之服务。教育的性质、目的、作用不仅体现了人类自身发展的要求，更重要的，还受到政治、经济的影响，反映着教育主持者的阶级意愿和利益。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起来以后，为了解决国内的矛盾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对中国东北等地疯狂进行军事、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推行奴化教育，抹杀东北人民的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正是为了实现长期霸占中国东北的图谋；降低文化知识水平，在重视实业教育上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正是为了经济掠夺的需要。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东北的不同阶段，随着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修改教育的政策和重点。伪满建立之初，为了消除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在思想教育上大肆宣扬“民族协和”、“共存共荣”；随着殖民统治的加深，日伪统治者于1937年抛出“新学制”，是殖民教育走上成熟的标志；为了适应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把伪满教育全面纳入战时体制。只有

把伪满教育放在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背景下加以深入考察，才能看清伪满教育的发展脉络和日本侵略者教育政策的反动本质。否则，仅仅停留在对教育规模、状况的一般资料性的表述上，便难以揭露奴化教育政策的实质。

(二) 要把伪满教育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加以研究。

伪满的教育方针、政策服从于并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在东北推行的奴化教育是其进行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首先宣布禁止悬挂中国国旗，废止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和排日教材，将《孝经》列为课程内容。伪满洲国成立后，即宣布实行“王道主义”教育，推广“礼教”，“必使境内一切民族熙熙皞皞，如登春台，保东亚永久之光荣……”。接着，便具体规定教育方针为：“重仁义礼让，发扬王道主义，对于人民生活方面，力谋独立安全；交谊方面崇尚自重节义；而对于世界民族，以亲仁善邻、共存共荣、以达于大同为宗旨”。1937年公布“新学制”时，进一步规定：“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之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为教育之方针。”1940年，再一次宣布伪满教育宗旨是：“奉天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示之唯神之道，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公之精神，训育忠良之国民，更使练成之。”把伪满的教育方针同其整个侵略政策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就可以知道，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根据实行法西斯统治、进行经济掠夺、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而制定的。其理论基础是“王道”与“神道”。当然，象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的目的不可能真正达到一样，由于受到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抵制，伪满奴化主义教育方针也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但这丝毫不能掩盖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目的。所谓“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之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健康”也是为了培养甘受殖民统治的“忠良国民”和能够为其创造社会财富的奴才。如果脱离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孤立地描述某些史实，片面地夸大传授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所谓功绩，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三) 要从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上加以研究。

我们知道，教育属于文化的范畴。同时，文化又是教育的来源和依据，教育乃是文化的选择、传递与创造。伪满的教育同样不能违背教育与文化的客观规律。

中国有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的组成部分，与中原文化同种同宗。殷末箕子适朝，向辽东传播礼义田桑。历代中原王朝为了安边实邦，巩固对边疆的统治，向东北地区宣传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原文化。鲜卑、高句丽、渤海、契丹、女真、蒙古、满等东北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民族发展和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需要，也积极奉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教育政策，对于多民族统一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日本帝国主义从1905年起，把“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作为培植殖民地文化的实验场，妄图借助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创造所谓“日满协和”、“共存共荣”的殖民地文化。但是这种文化统和是以军事侵略和政治压迫为前提的，必然受到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抵制。这是其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屠杀、奴役中国人民，动辄扣上“思想犯”、“经济犯”的罪名，却幻想让被压迫的东北人民对侵略者、刽子手讲忠尽孝，讲礼让。日本帝国主义口头上宣扬的“民族协和”、“一德一心”、“东方道德”的高调与侵略暴行恰恰形成了绝妙的讽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总是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为之所用，却不曾被外来文化所利用。日本帝国主义一反“五·四”新文化的进步潮流，恢复祀孔读经，并把日本的神社搬到东北，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来阻碍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这种违背中国文化发展规律的倒行逆施必然不能得逞。从教育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伪满教育史，不仅会开拓研究的思路和视野，也更容易加深对教育规律的认识。

(四)要运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伪满教育史。

包括伪满教育与伪满之前和伪满之后东北教育的比较；包括伪满教育与台湾、朝鲜、东南亚等其他日本殖民地教育的比较；包括殖民地中国人教育与日本人教育的比较；包括伪满教育与日本国内教育的比较。通过比较，会加深对伪满教育的特点、本质、状况等的认识。比如，日本侵略者在东北为什么没有采取在台湾和朝鲜那样的强制性同化主义教育方针？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到底是提高了东北人民受教育的程度还是阻碍了东北近代化教育的发展？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对东北的日本人教育采取“乡土化”措施，等等。只有进行比较研究，才能透过现象得出正确的历史结论。

比较研究有许多方法，仅以采取量化的方法为例，我们便会看到，日本在东北用于教育的经费只占从东北掠夺走的大量财富中的很小一部分；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教育条件要比中国人的教育条件优越得多；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教育甚至好于日本国内；日本侵略者在“关东州”经营40年所达到的教育程度我们在解放后仅仅用了四年时间就超过了。

应当承认，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伪满教育史，尚处于拓荒的阶段。在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我们辽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过去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还是很不够的。希望中日学者加强学术交流，繁荣东北及伪满育史的研究。

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及其运用

李 放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5年日俄战争，在半个多世纪里，帝国主义列强凭仗坚船利炮，对中国鹰攫鲸吞，瓜分沃土，当时的日本依据日俄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和日清签订的《中日会议东北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占有了旅大地区的租界权和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及其权益，致使中华民族陷入屈辱的地位，亿万民众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神州大地腥风血雨，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尤为甚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使中国东北全境沦为殖民地，在屠刀下的东北人民成为被宰割的奴隶。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征服民心，培养驯服的奴仆，又在沦陷区积极实施奴化教育，进行文化教育侵略。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迄今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然而，如何看待东北沦陷时期的教育，还其真面目，并从中汲取历史教训，这不仅是研究东北地方教育史之所需，而且是加强与改善中日两国的关系，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客观要求。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这其中，首要的问题是东北沦陷时期的教育，究竟是“王道乐土”的“和平教育”，还是殖民地的“统治教育”；是民族压迫的“奴化教育”还是日满亲善的“智民教育”；是政治韬略的“愚民教育”；还是强国富民的“济世教育”，诸如此类的见解，在近半个世纪里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纷繁复杂，莫衷一是，呈现出一片“色彩斑斓”的理论世界，有待于我们去探索、去澄清、去论定。问题的关键在于运用哪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剖析，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运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还是从人道主义出发，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这将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因此，我们说，解决正确的方法论问题，乃是统一认识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的前提。

一、研究方法论的阐释

我们认为，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心主义。人所共知，世界万物都是客观存在，都有其运行发展的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表现为发现和遵循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却不能随意编造、改变它。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则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我们还认为只有在这条科学认识路线指引下，才能正确选择和运用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现代方法，从而才能正确采用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并使之有机地形成一个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方法论体系。其中，哲学方法要讨论科学的对象、理论和方法的关系，而“三论”方法虽然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有较高的概括程度和较大的运用范围，但它却不能象哲学方法那样抽象地对待世界，而是较为具体地、精确地、定量地对待世界，是一种“胶合剂”，把哲

学方法与具体的科学方法牢牢地粘在一起；它是一种“转换语言”，使哲学方法转化到各部门的科学方法之中，又使各部门的科学方法统帅于哲学方法之下。至于具体的科学方法，它在哲学方法和“三论”的指导帮助下，可供采用的方法是繁多的，歧异的，而不是固定的、万能的。它们是以课题研究的需要为依据而被纳入科研方法体系之中，起着攻坚的“尖兵”作用。这些具体的科学方法，在科学分类上可分为旨在了解过去教育发展实况的历史研究法；旨在探讨现在教育活动真象的现状研究法；以及旨在预测未来教育发展状态的实验研究法。当前更新的科学分类则是把具体的教育研究方法分为五种类型，即历史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理论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此外，还有其它分类，但就其科学性来说，远不如上述的分类。显然，研究东北沦陷时期教育，首要的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并要在其指导下，根据研究的需要，恰当地选择与运用“三论”方法和具体的研究方法，惟其如此，才有可能追寻、探索 and 发现一个新领域，得出一个新结论，为科学殿堂增添一个新的颗粒。这就是所谓的“凿石取玉，剖蚌求珠”，决不该主观臆断、鱼目混珠、以假乱真。

现今，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采用科学的方法体系，对东北沦陷时期教育，根据历史事实，做一番客观剖析，力求取得一个符合实际的共识。这是既有益于东北教育史学的研究，又有利于中日邦交的学术活动，相信会受到坚持真理、造福人类的学者们的欢迎和支持。

二、研究方法论的运用

研究方法论源于研究实践，高于研究实践；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是实践的高级表现形式，它对实践起着指导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便没有正确的实践活动，也就得不出新的科学认识。同样，研究方法理论与研究方法运用的关系也是如此。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研究东北沦陷时期的方法论体系，其中的哲学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根本的，起决定性的指导作用，是区分两种方法论体系的“灵魂”与标志，而“三论”方法和具体的科学方法则是从属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化和实际运用。据此，我们对东北沦陷时期教育，主要从以下三个部分进行研究。

（一）历史反思

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是客观存在、是铁证。事实也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如果“起点有错、结论必误”，这是科研实践反复验证过的真理。想要起点不错，对待事实必须做到客观、翔实、公正。首先，我们来看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的实施状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原东北已建立起来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悉遭破坏，各级学校被迫关闭。到1933年小学仅恢复9100所，只占事变前的小学13000余所的70%；学生数502100余人，占事变前的学生数747100人的68%；教师16290人，占事变前的教师数24400人的66%。到1937年，中学才恢复173所，占事变前194所的89%；学生33600余人，占事变前学生数38500人的87%；教师1600余人，占事变前教师数2400人的66%。1933年开课的高等学校只有2所，1935年只有5所，1937年也只有10所，占

事变前30所的33%，实在少得可怜。可是，日本侵略者在对东北地区教育破坏的基础上，又采取了一系列的奴化教育措施：

1. 为了加强对各级学校的控制，指派了大批日本人充当校长、副校长或学监、主持，以及教师，直接监视中国教师的言行；

2. 废除排日教材，编审“国定教材”，强行向青少年灌输所谓的“建国精神”、“王道政治”、“日满亲善”，以及“大东亚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

3. 将日语作为“国语”列为教材，并设置“语学津贴”，以资鼓励，意在“使学生体认日本精神，努力发挥日满一德一心之真义”；

4. 为了使在职教师能按照日本侵略者的意图去教育学生，先后开办了“教员讲习会”、“教员讲习所”，加强对在职教师的培训，以清除他们的“不纯思想”，提高他们奴化学生所需的素质；

5. 为了抵制爱国学生反满抗日的斗争，日本侵略者封闭了事变前的主要大学，剥夺了大部分青年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虽然日伪统治者为适应经济掠夺的需要和防止学生产生民族意识和民族思想，也只开办了为数甚少、规模较小、专业残缺的农、工、医等类学校，极力限制文科学校的发展；

6. 为保证伪满的教育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方针政策发展下去，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各级教育“指导监督”机构，“务善导国民之思想，以养成忠良之国民”。实际是强迫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按着教育警察机关的旨意行事，如稍有不从，轻则免职、开除学籍，重则被杀头，甚至株连九族。

上述的若干奴化教育措施，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重点由建立和巩固殖民统治秩序向配合扩军备战的经济掠夺方面转变，于1937年春夏之交，审议通过并公布实施了所谓“新学制”。它的基本内容是：提出了完整的奴化教育方针，其核心是实现所谓的“王道教育”；确立了系统的学校教育体系，即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个阶段和师道教育、职业教育两个部门，使伪满的教育完全纳入了殖民主义的轨道。1937年以后，各级学校虽然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仍未达到事变前的发展水平。然而，彻底的殖民化教育却使中华民族教育丧失殆尽，严重地影响了东北人民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

与此同时，在“关东州”（旅大地区）和“满铁附属地”，日本殖民者对它统辖的教育事业，实施民族差别待遇的方针和政策，除对中国人设校施教，培养驯服的奴仆，实现“皇民化”外，不遗余力地兴办日本人学校，培养“忠君爱国”、“随土而安”、“在世界各地到处开拓”的侵略者。这种侵华日本人教育，到1945年“八·一五”前夕，仅占全地区人口165万人的14%的日本人（23万人），在他们开办的小学校里，就学率高达99%以上；中学校学生亦达1万人，而在大学本科就读的日本人（1742人），却占中日学生同校人数（1864人）的93.5%。把日本人教育同中国人教育两相对照，日本侵略者的用心就昭然若揭了，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笔者就是这个历史时期教育的见证人，也是这个历史时期教育的受害者，虽然由于历史条件和个人处境的局限，当

时对其不得一览全貌，洞察祸心，却有被奴役的切肤之痛，这是至今所不能忘却的。事实总归是事实，它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判定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的基础和依据，这是谁也不能逾越和改变的历史真实。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对它进行科学的论证而已。

（二）客观剖析

面对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的历史事实，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与判定，这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重大学术课题，必须从事实出发，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地对它进行客观的剖析。

首先，从客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来看，任何教育都是一定政治、经济的反映，反过来又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文化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内在的必然联系。东北沦陷时期教育同样是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并为之服务。理论上是这样，事实本身也是如此。这从当时日本侵略者所制定的教育方针可以判明与证实。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作为“政治工作的第一步棋”，就是设校施教，旨在从精神上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国家观念和革命思想，使中国居民归化于日本。这种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在日本殖民统治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方针上。早在20世纪初，日本辽东守备军军政长官陆军少将神尾光臣的训令就说：“目前各军在军事上需要做好的工作虽然很多，但同时效力于疏导清国官民，勤于职守和生产也是当务之急。其中首要的任务应是教育事业”。其性质正如“关东州”掌握学务的民政署庶务科长关尾二郎所阐释的那样：“关于新领土的教育方针，也就是统治方针。因此，我们不能够把它轻易道尽，简单言明”。真是不打自招，欲盖弥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认为要把东北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置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光靠武力征服是难以达到的。所以，他们在血腥镇压东北爱国力量的同时，加强对奴化教育的实施，提出：“以王道为实施教育之方针”。其内容则是“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旨趣，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予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满洲帝国学习要览》，伪民生部教育司1941年编）。实际上是把法西斯统治思想“徐徐灌注于民众教育及幼年教育之中”，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培养驯服的熟练劳动者和忠实的走狗与奴才。

这个教育方针的精神从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的微观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印证。日本侵略者为强化“建国精神”教育，在各地创建了建国神社，奉祀日本的“天照大神”，并在中小学设置“建国精神”科，强化时局教育，开设日语课，等等。意在要人们对日本天皇和傀儡皇帝崇敬和服从；拥护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宣扬“日满共同防卫”思想，为大东亚圣战效劳。为配合这种教育，还在中等以上学校增设教练科，普遍实行军事训练，以培养战争的后备军。此外，还强迫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参加“勤劳奉仕”活动，把学生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时劳动大军。这些都是铁的事实，并在事实中包藏着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用心。如果把它们同侵华日本人教育相比，就会更好地把日本侵

略者愚弄中国人的骗局揭露无余。侵华日本人教育从教育方针上虽然也宣扬“国际亲善”、“民族协和”、“博爱共存”之类的高调，但其实质内容是大力培养殖民思想，驱使日本教职员和学生“热爱这块土地（满蒙地区），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故乡，进而向西伯利亚进发”，为其“大陆政策”效命。由此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并认定前者，即中国人教育是培养奴仆的教育，后者，即日本人教育是培养侵略者的教育，应该说这是不会发生歧议的。

其次，从教育发展的外延与内涵来看，东北沦陷时期的中国人教育，总体上的数量、规模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有所压缩，尤其是限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这在前面的历史反思中已经作了陈述，勿庸赘言。就是在其内涵的质量与水平上也有所降低。如中等学校由原来的三·三制改为四年一贯制，减少了一年，难以完成基础教育传授一般文化科学知识任务。而高等学校也由四年制改为三年制，无法保证近代高等学校在学术上所要达到的水平是可想见。至于在德育、体育方面就更提不上来了，它们所造成的曲扭的思想品德（奴隶性格）和畸型发展的身体（熟练的劳动力），严重地损害了一代中国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在这里也应该看到，当时的部分学校，如“施行以实业教育或实务教育为主眼之国民教育”和职业教育，尽管是使青少年一代充当为日本侵略者效力的熟练劳动力，但是由于强调“知识技能”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光复后的东北经济建设准备了基础条件。此外，还有少数思想进步并富有学识的教师，在言传身教中积极影响和启迪了一些爱国学生，使之成为青年一代的中坚分子，为祖国的复兴、人民的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东北沦陷时期教育发展的历史辩证法所使然。

最后，从主观与客观上看，日本侵略者的本性决定只能是为了殖民地政治、经济的需要而举办教育事业，以培养为其经济掠夺、政治同化服务的奴仆和奴才。事实上，在这方面他们已经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培养了一大批供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驱使的“顺民”和为经济掠夺服务的劳动力。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办教育决非恩赐于中国人，从所谓的“人道”上“使之沐浴到文明的阳光”。凶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是不会对其掠夺压迫的对象大发慈悲之心的，从来如此，无一例外。然而，人世之间却会有“事与愿违”的情况发生，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沦陷时期所“苦心经营”的教育事业，就是一个适例。如同英属印度，由于智育开发而陷入之“弊害”一样，客观上“貽误”了他们的殖民政策。这是日本侵略者所始料不及或者是无法避免的后果。

知识就是火种，就是力量，人民一旦拥有了它，就会摆脱愚昧，就会辩明真伪善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历史，也是东北人民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不要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感召下，东北人民英勇斗争、前赴后继，谱写下的爱国主义的壮丽篇章，就是在敌伪时期养成的广大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也曾自发地利用隐蔽的斗争形式，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开展反满抗日的救亡活动。如1935年，海龙县第六小学女教师文静一（22岁），安荣卿（21岁），目睹日本侵略者惨杀无辜同胞，义愤填膺，密谋刺杀日本高官，为死

者报仇，虽然壮志未酬，惨遭杀害，但是她们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却鼓舞着广大爱国教育工作者继续战斗。又如，在日伪的高等学校中爱国学生曾组织过“东北青年救亡总会”、“读书会”、“恢复会”等抗日救国团体，它们英勇斗争，决心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这些组织在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很多会员被敌人长期监禁，或惨遭杀害。在东北大地上涌现出来的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日本的殖民地教育走向反面的结果，反满抗日的爱国师生竟成为日本侵略者为自己培养的挖募人。历史就是这样嘲弄和惩罚一切侵略者。

（三）简要结语

历史是无情的，它宣扬正义，鞭笞邪恶，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因为历史发展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即使一时出现历史的逆流，也终归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方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下场，就是历史的明证。他们的政治统治、经济掠夺是这样，教育奴化也不例外。尽管日本帝国主义者精心策划、苦心经营、粉饰太平、愚弄民众，到头来都被教育的事实、教育的举措、教育的结果所揭穿，对日本侵略者留下的只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而他们却成为历史的罪人；带给日本人民的则是内疚与负重；而为中国人反满抗日斗争和东北地区光复后的建设却培育了火种和力量；日本侵略者“洒向人间都是怨”，中国人则在苦难中站起来，这就是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的历史总结。

我们中日两国人民站在今天这个历史的节点上，应该共同反思历史，展望未来，并从历史中汲取血染的教训，从未来把握真诚的友谊，为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书目：

- 1 《东北地方教育史》，1992年，辽宁大学出版社。
2. 《东北教育通史》，1992年，辽宁教育出版社。
- 3 《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三集上），1990年，辽宁大学出版社。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教育史的几个问题

颜震华 王庆玲

教育的发展过程是有共性的，但由于时空的不同又有特殊性，研究教育史时则应把握这一规律。从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旅大和南满铁路，经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历时40年。其间，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同时也是日本由资本主义演变成帝国主义向外扩张乃至失败的过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教育史，就是在这样的时空中发生、发展和结束的。因此，我们觉得以下三个问题应予注意。

一

不能只就教育研究教育史。教育同政治、经济的关系十分密切，既服务于政治、经济，促进其发展，又要受政治、经济的支配。只有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教育史同其侵略中国东北政治、经济史联系起来研究，才能认清其殖民地的本质。

首先，简略回顾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有显著发展，但伴之而来的是种种矛盾。为摆脱这种困境，日本统治集团制定了“强兵为富国之本”的基本国策，大力扩张军备，企图到邻近国家寻找“利益线”、“生命线”，并逐步形成侵略朝鲜、中国乃至称霸亚州的“大陆政策”。在扩张政策的支配下，甲午战争后占领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日俄战争后攫取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并把它改称为“关东州”，设置“关东厅”；夺取南满铁路，成立“南满州铁道股份公司”（简称“满铁”）；1919年又将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命名为“关东军”，从而建立了以“关东州”为据点，以“关东军”、“满铁”为工具的侵略中国的桥头堡。

为继续推行“大陆政策”，田中内阁于1927年六、七月间召开了“东方会议”，策划制定了以侵略中国东北为中心的“积极政策”，决定以“铁与血”的手段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基本方针。为落实“东方会议”精神，一些军国主义者先后策划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日本灭亡满蒙秘密计划》、《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加紧了入侵中国东北的各种准备。终于在1931年悍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把中国东北掠为它们的殖民地；以此为基地，1937年发动芦沟桥事变，全面推行侵华战争，1940年发动太平洋战争，直至1945年无条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教育史，就是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而发生、发展和结束的，这一历史事实就规定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教育史的殖民地性质，以及我们研究它应持有的基本立场。

其次，日本帝国主义是怎样进行殖民统治的。“关东州”及“满铁”公开由日本帝国主义控制，而对“满州国”是怎样进行殖民统治呢？日本关东军于1932年6月抛出《指导满洲国要纲》（草案），提出了控制伪满政权的基本政策，即“为实行帝国对满

洲国的国策，不特别设立文治机关，专使关东军担当其任，实施中，努力保持新国家为一独立国的体面，而在满洲国的名义下通过日本人系统的官吏，特别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对于满洲国的要求事项，一切均由帝国政府通过关东军司令官（驻满全权大使），通知满洲国使之付诸实施。”伪满“国务会议之决定事项，于提交参议院会议之前，必须使总务长官向关东军参谋长通报；凡有关东军难以认为妥当的事项时，由参议院会议加以改正”。关东军上述意见，得到日本政府首肯，同年8月8日，日本政府就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了《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确定了对伪政权的控制政策。

伪满傀儡政权则完全以此政策行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溥仪颁发的“诏书”，则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1934年（康德元年）颁发的《即位诏书》中说：“所有守国之远图，经邦之长策，当与日本帝国协力同心，以期永固”。这等于宣告伪满洲国的性质和基本国策。1935年，溥仪第一次访问日本回来颁发的《回銮训民诏书》，把“当与日本帝国协力同心”，更加明确为“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图和盘托出。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颁发的《时局诏书》，则提出“以盟邦之心为心”，“发扬一德一心之真义，举其全力，以贯彻共同防卫之精神”。表明拥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1940年，溥仪第二次访日回来颁发《国本奠定诏书》，除提“训以一德一心之义”外，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即“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并把它“式为永典”。把日本的皇道、神道、唯神之道移植到“满洲国”。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颁发了《时局诏书》则进一步强调“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齐与其臣民咸有一德一心，夙将不可分离关系”，“生死存亡断弗分携”，甘心同日本帝国主义同归于尽。溥仪谨奉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数次颁发“诏书”，其中心只有一点，即日“满”一德一心，帝国主义之心即我心。所谓“一德一心”，就是一切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从，当然也包括教育在内，所以伪满的教育方针，就是依据日“满”一德一心的精神来制定的。

再次，培养“忠良之国民”的教育方针。教育方针规定着教育的根本方向和培养什么样的人，一切教育政策和措施概源于此。伪满初期确定以“王道”为立国之本，因此1933年出版的《第一次满洲国文教年鉴》则提出“种族观念、排外思想，务使根本铲除，不遗丝毫芥蒂”，“以王道为实行教育之方针”。这一方针虽未明确提出日“满”“一德一心”，但已包含在铲除“排外思想、种族观念”之中了。1937年制定的《学制要纲》，对上述教育方针作了新的补充，使其更加完善，该方针是：“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点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与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方针的核心是培养“忠良之国民”，正如伪文教部大臣阮振铎在阐释教育方针时所说的，“一言以蔽之，曰以养成忠良之国民为目标，即鉴于我建国之理想与国体之特征，以养成深明善体国家观念及国民精神而忠诚奉公竭力事上之国民，为我国教育之主眼”。明确指出伪满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忠良之国民”。